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 地域性自主参与

——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

胡 荣

提要: 根据 2001 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 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参与村级选举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 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 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 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 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 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 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域性的自主参与。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村级选举 地域性自主参与

一、相关理论与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 政治参与这个概念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传统研究政治参与的学者都有两个假定: 一是政治参与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政体; 二是选择领导人的权力是普通公民表达他们利益的必要条件。1950 和 1960 年代在西方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极权模型 (totalitarian authority) 十分强调掌权者对民众的控制和动员。这一模型把前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看作是由精英所支配的; 这些精英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来改变社会 (Freidrich et al., 1969: 126)。在这些社会中, 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 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政府通过限制结社自由, 可以有效地阻止利益的聚合, 使人民失去抗拒政治权威的能力。它赋予国家如此广泛的控制, 以至于一些极权理论家认为这些政权能够消除国家和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 甚至是国家与个人人格之间的界限。因此, 个人所面对的是国家的操纵, 人民被动员起来亢奋地支持领导人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是不受大众

的观点所影响的 (Friedrich & Brezezinski, 1956: 161—171)。在这些学者看来,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设置不仅阻止了民众的要求上达到精英那里, 而且也使公民失去了能够让精英倾听他们意见和观点的手段。在这些社会中虽然也有游行、示威以及流于形式的选举, 但这些都是由当局组织以动员一般民众支持政府的, 而不是由民众自身用来向当局表达他们的观点的, 这些参与仅仅在表面上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参与相类似。不过,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冷战的减弱以及共产党社会的变化, 学者不再对刻板的极权模型感兴趣。许多研究表明, 随着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的减弱, 在政治控制的架构下伴随着真正政治竞争的复兴, 不仅是党的机构, 而且警察、军队、工业部门的管理者、经济学家、作家以及法学家都对政策的形成过程有重要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发现新出现的群体已经开始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 (Skilling & Griffiths, 1971; Goodman, 1981; Falkenheim, 1984)。与极权模型的看法不同, 利益群体理论家认为, 在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并没有被看作是拥有绝对权力的, 而是有内部不同派系斗争的。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通过表明共产党社会中也存在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表达, 利益群体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研究者对这些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不过, 这一模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他们和集权模型的理论家一样, 认为有意义的政治参与需要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将人民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过程联系起来。因为在共产党社会中政治的活动和组织 (诸如选举、群众运动、工会以及农会等) 都是由当局操控的, 目的是消除自愿团体的形成, 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 普通百姓的政治活动不能与决策过程有效联系 (Liu, 1976: 5)。

很显然,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将政治参与的概念用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将会造成“严重的和令人遗憾的不准确” (LaPalombara, 1975)。对他们而言, 政治参与是以多元的政治体系为前提的, “因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帮助我们界定特定类型政体的概念, 它并不适用于比较分析和用于描述那些明显不属于民主的政体” (LaPalombara, 1978: 71); “文献中的政治参与概念并不适合共产党制度的研究” (Sharlet, 1969: 250)。因为, 共产党社会中现有的制度只起着诸如政策实施和政治社会化等作用。他们建议重新定义政治参与以适应这些社会的政治现实。例

如,汤森在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经典研究中,就将其定义为“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民众对由共产党所界定的最高的、统一的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支持”,或是“在政治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导向性介入”(Townsend, 1969: 4-6)。

为了能够在地域和时间上适应于更广范围,并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结合到传统的参与模式中去,1970年代逐渐出现了并不一定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参与概念。在这一新观念下,参与仅仅是指不同政治制度下普通公民以任何方式试图影响他们的统治者的行动。例如,尼·诺曼和西德尼·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诺曼、伏巴,1996: 290)。与此同时,原有的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将投票看作是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和惟一方式)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维伯等人对美国以及七国参与和政治平等的研究发现,除了投票和竞选活动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其他手段,例如借助共同的活动和个人的接触以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或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偏好(Verba et al., 1971)。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些观点。对苏联的相关研究发现,那里的民众对他们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有清楚的了解,许多人在追求他们的利益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与政治的现实相适应。例如,英克尔斯和鲍尔的研究表明,苏联的民众清楚地将物质的东西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区分开来。“苏联公民更关心获得更多个人的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很少关心获得政治权利和宪法的保障”(Inkles & Bauer, 1959: 7)。苏联的民众确实会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以追求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刻意避免在表达个人利益时直接对抗他们的领导人。比尔勒则在对斯大林之后苏联政权的研究中,在概念上区别了“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与“低层政治”(low politics)的不同(Bialer, 1980)。“高层政治”涉及社会中的主要政治问题、政治的抽象观念和语言,以及政治领导中的决策和行动。“低层政治”涉及与公民日常生活、社区事务以及工作单位条件直接相关的决策(Bialer, 1980: 166)。苏联公民对高层政治冷漠、不关心,但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低层政治。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共产党国家,民众批评政府或不同意其政策,但很少试图取而代之。

就中国的整体制度而言,高层政府官员并未实行直接选举,显然一般百姓无法像民主国家一样通过选举来表达意愿。目前中国各级政府

官员虽然也是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通常候选人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确定,而且参与投票的代表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在原有的体制中,选举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参与途径。但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胡荣,2001)。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渠道。

许多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与该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托克维尔(1988)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把美国的民主与美国人普遍而广泛的结社情况相联系。阿尔蒙德等人在研究五国的公民文化时也通过实证材料表明,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系与民主制度具有相关关系(阿尔蒙德、维伯,1989)。美国政治学者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其他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要好。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下的定义为:“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195)。换言之,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在帕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帕特南,2001:200)。那么,信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平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遵循普遍互惠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

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帕特南,2001:203—204)。

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目前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方面(例如,阎云翔,2000;Bian,1998),而且也多限于城市社区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人研究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构成与其社区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打算运用帕特南的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并据此分析探讨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我们将探讨如下问题:社会资本是否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政治参与起作用?如果起作用的话,社会资本中的哪些因素起更大的作用?村民个人情况对他们的参与有何种影响?村级选举的相关制度对村民的参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的测量

本项研究于2001年9月至10月进行。样本按多阶段抽样法抽取。第一阶段采用立意抽样方法,从福建省内抽取寿宁县和厦门市,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种类型农村。寿宁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与浙江省交界,距省政府所在地福州市284公里,全县辖10乡、4镇、201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22万。寿宁县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厦门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济较发达,农村的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厦门下辖6个区,大部分区的城市程度较高,我们选择城市程度相对较低的同安区,从中选择4个乡镇,另从城市程度较高的厦门岛内选取1个镇。我们又用随机方法从寿宁的14个乡镇中抽取5个乡镇,具体方法是:先根据各乡镇2000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参看县经管站的数据)由低至高将全县14个乡镇按顺序排列;而后将全县的农业总人口222144除以要抽取的乡镇数5,得44428.8。在44428.8数内随机确定一个数,即23000,选中的第一个乡为大安乡。第二个乡按23000加44428.8的方法确定,为犀溪乡,余类推。抽样结果共选出大安、犀溪、竹管垅、武曲和鳌阳5个乡镇。

在厦门同安区也用类似方法随机抽取 4 个镇,即莲花镇、大嶝镇、马巷镇、大同镇,另加上厦门岛内的禾山镇,共 5 个镇。而后再从各个乡镇中按随机方法各抽取 4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再按随机方法抽取 25 个 18 岁以上村民,共 1000 人。调查在 2001 年 9 至 10 月进行。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经过相关培训的 1998 级学生 19 人担任访问员。寿宁的调查自 2001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厦门的调查自 2001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本次调查共成功访问村民 913 人。其间,每个村大约成功访问 20 至 25 人。在成功访问的对象中,男性占 56.3%,女性占 43.7%。从文化程度看,调查对象中读书 4—6 年者最多,达 30.7%,其次是读书 7—9 年者,文盲达 18.2%,上学 1—3 年者占 12.1%,而接受 10 年以上教育者的比例则非常之少,10—12 年者只占 9.1%,13 年以上者仅为 1.6%。从年龄结构来看,30 岁以下者占 24.4%,30—40 岁者最多,占 23.6%,41—50 岁占 23.6%,51—60 岁占 12.9%,而 61 岁以上则较少,61—70 岁占 7.5%,71 岁以上只占 3.5%。

为了弄清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个回归模型,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在选举中参与程度的影响。先看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这一指标。在本项研究中,作为因变量,我们在问卷中列了 16 方面的问题测量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包括是否参与候选人的提名、是否参与投票等。在这些项目中,有的参与者比例较高,如参加投票者占受访者的 79.5%,而其他一些项目的参与者则比较少(参见表 1)。

我们根据主成分法对这 16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 4 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预选因子、竞选因子、提名因子和罢选因子。“预选因子”包括:“参加预选会”、“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提问”、“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表看法”。“竞选因子”包括:“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票”、“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参加投票”。“提名因子”包括:“单独提名候选人”、“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与其他村民一起提名候选人”、“毛遂自荐当候选人”。“罢选因子”只有两项:“因为对选举不满意而拒绝参加投票”和“因对选举安排不满意而动员别人不投票”。为了把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程度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我们把 4 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而后相加,

即: 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 = 预选因子值 × 0.21197 + 竞选因子值 × 0.13498 + 提名因子值 × 0.10638 + 罢选因子值 × 0.09167 (见表 2)。

表 1 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

项目	人数	比例
1. 单独提名候选人	56	6.1%
2. 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	21	2.3%
3. 与其他人一起提名候选人	68	7.4%
4. 毛遂自荐当候选人	16	1.8%
5. 参加预选会	111	12.2%
6. 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人	48	5.3%
7. 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票	44	4.8%
8. 参加投票	726	79.5%
9. 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	55	6%
10. 对于不恰当的选举安排提出批评和建议	44	4.8%
11. 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	69	7.6%
12. 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提问	30	3.3%
13. 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	59	6.5%
14. 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表看法	29	3.2%
15. 因为对选举安排不满意, 拒绝参加投票	29	1.9%
16. 因为对选举不满意, 动员别人不参加投票	4	0.4%

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本项研究重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的测量。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尽相同, 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定义也存在差异 (参看 Lochner et al., 1999; Onyx & Bullen, 2000; Barayan & Cassidy, 2001), 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帕特南等人定义中的主要内容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在帕特南所讲的社会资本中, 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网络 (当然这种网络是平等和自由的) 是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其他许多研究也谈到这一点 (Putnam, 1993; Portes, 1998; Woolcock, 1998)。根据本项研究的目的, 我们分别问被访者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情况, 以及被访者是否经常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

表 2 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的因子分析

项目	预选因子	竞选因子	提名因子	罢选因子	共量
单独提名候选	.297	.079	.398	-.063	.257
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	.189	.382	.531	.106	.474
与其他村民一起提名候选人	.110	.007	.651	.036	.437
毛遂自荐当候选人	-.039	.249	.622	-.047	.453
参加预选会	.566	-.113	.435	.066	.527
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人	.101	.743	.111	.153	.598
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票	-.010	.713	.137	.181	.560
参加投票	.059	-.351	.333	.187	.273
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	.339	.681	.168	-.012	.606
对于不恰当的选举安排提出批评和建议	.462	.359	.118	.261	.424
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	.788	.016	.215	.026	.668
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提问	.821	.256	.033	-.095	.750
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	.818	-.047	.136	.042	.692
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表看法	.790	.230	-.039	.086	.686
因为对选举安排不满意,拒绝参加投票	.017	.055	.082	.780	.618
因为对选举安排不满意,动员别人不参加投票	.052	.179	-.065	.811	.696
特征值	3.392	2.158	1.702	1.467	8.719
平均方差	21.197%	13.489%	10.638%	9.167%	54.491%

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交往。测量村民与行政村内的不同交往对象的问题共 7 项,答案按里克特量表的格式设计,分为“经常来往”、“有时来往”、“较少来往”和“很少来往”四个等级,根据受访者的不同回答分别记 4 至 1 分。另一方面,我们还测量了村民的社团参与情况。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根据他对意大利的研究,意大利北方的民主运作比较好,主要原因就是那里有众多的横向社团,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这些社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横向社会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共同利益的合作。借鉴帕氏如此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我们分别列出如下几种社团组织,

即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组织、老人会、企业组织、科技组织、民间信用组织、体育组织、宗教组织、寺庙组织等,问被访者是否参与这些组织,以测量、分析其社团参与情势。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互惠。帕特南把互惠分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则指在特定时间的无报酬和不均衡的交换,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用泰勒的话说,这是一种短期的利他主义和长期的自我利益的结合(Taylor, 1982),或用托克维尔的话:“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这种互惠的规范在农村社区的主要表现是亲友和邻居之间在农忙季节相互义务帮工,比如今天我帮你割稻,下个月可能你帮我插秧。村民在从事一些需要较多人力的活动时,比如建房子,更需要得到亲友和邻里的帮助。通常建房的村民不为帮工的村民提供报酬,但是当其他村民建房需要帮工的时候,现在的建房者也要提供义务帮工作为回报。不过,近年来,由于建房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村民请专门的建筑队建房,这一相互义务帮工的情况有所减少。于此,我们问了两个问题:一是过去一年被访者是否与亲友之间有过义务帮工,二是过去一年被访者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信任。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信任(韦伯, 1995)。福山(2001/1998)也强调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之外其他人的信任。但是,最近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都支持这些观点。例如,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在调查中,我们分别问被访者对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测量村民信任程度的7个项目的答案也分为四级,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有点信任”和“不信任”,分别记4至1分。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第四方面是规范。社会规范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从而减少了对正式制度制裁的依赖。社会规范通常是不成文的,但为社会成员所普通理解和接受。科尔曼(Coleman, 1988)和帕特南(Putnan, 1993)都认为,在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犯罪和越轨行为少,不需要太多的警力维持治安,社会成员因而也有更多的安全感。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要求被访者回答他们所在的村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家中失窃”和“邻里吵架”这类事情。在问卷中,我们列出如下一些问题以测量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你认为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你经常会因为你是本村的村民而感到光荣吗?”“与周围的村相比,本村的社会风气如何?”“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地里庄稼被盗的事情?”“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家里东西被盗的事件?”“你村是否经常发生邻里争吵事件?”有关社区安全和社区认同方面的问题的答案也分别为4级或5级:“邻村的姑娘是否愿意嫁到本村?”这一问题的答案分为“很愿意”、“较愿意”、“一般”、“很不愿意”和“较不愿意”5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你认为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的答案分为4级,即“很有安全感”、“较有安全感”、“较少安全感”和“没有安全感”,分别赋值4至1分。“你会经常因为你是这个村的村民而感到光荣吗?”答案分“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4级,分别记4至1分。“与周围的村相比,本村的社会风气好不好?”答案分“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很差”5级,分别记5分至1分。另外3个问题,即“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的事”、“你村是否经常有村民家里的东西被盗”以及“邻居之间是否经常吵架”的答案分为4级,即“经常发生”、“有时发生”、“很少发生”和“没有发生”,分别记1至4分。

在确定了测量社会资本的问题和项目后,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些项目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可以概括为哪几个方面?为此,我们进行了因子分析。有关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以及社区安全和社区认同方面的问题均按利克特量表的方式设计,答案分为4级和5级两种。有关社团参与方面的问题的答案只分为“是”“否”两种,凡回答“是”者记1分,“否”者记0分。有关社团的问题共10项,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我们把每个受访者对这些项目的回答加在一起计为一项,总分的高低表示其参与社团的多少。测量互惠规范的两个问题,即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和是否为邻居义务帮工的答案也只有“是”“否”两个答案,凡回答是者记1分,两个问题的得分加在一起作为一个项目,与其他项目一起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

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社会资本的23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6个因素。根据因子负载,我们分别将这些因子命名为:信任因子、社会交往因子、社区安全因子、亲属联系因子和社团互助因子。第一个抽取的是“信任因子”,包括对亲戚、家族成员、

表 3 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

项 目	信任因子	社会交往因子	社区安全因子	亲属交往因子	社区认同因子	社团因子	共量
与亲戚是否经常来往	.134	.172	.084	.756	.214	.082	.678
与本家族成员是否经常来往	.188	.334	.087	.730	.178	.098	.729
与同姓村民是否经常来往	.220	.567	.085	.540	.106	.046	.681
与同小组村民是否经常来往	.190	.764	.017	.328	.074	.023	.733
与同自然村村民是否经常来往	.218	.844	.025	.190	.058	.025	.801
与同行政村村民是否经常来往	.154	.854	.018	.008	.047	.002	.756
与村干部是否经常来往	.176	.450	-.020	-.047	.319	.465	.553
是否信任亲戚	.672	-.175	.060	.419	.139	.126	.696
是否信任家族成员	.754	-.059	.045	.437	.136	.078	.790
是否信任同姓村民	.847	.141	.054	.257	.049	-.022	.809
是否信任同小组村民	.865	.255	.030	.085	.088	-.060	.834
是否信任同一自然村的村民	.872	.323	-.001	.036	.088	-.041	.876
是否信任同一行政村的村民	.813	.378	-.001	-.101	.070	-.038	.820

续表 3

项 目	信任因子	社会交往因子	社区安全因子	亲属交往因子	社区认同因子	社团因子	共量
是否信任村干部	.581	.198	.045	-.142	.271	.351	.596
邻村姑娘愿意嫁到本村吗	.055	.025	.143	.077	.565	-.086	.357
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	.076	.152	.034	.158	.622	.027	.443
是否因作为村民而感到光荣	.134	-.023	.038	.066	.698	.140	.530
本村的社会风气如何	.094	.075	.282	.087	.644	.014	.516
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的事	.020	.047	.803	.023	.119	.002	.661
是否经常发生家里东西被盗	.033	-.036	.826	.048	.166	.091	.724
邻居之间经常吵架	.051	.046	.776	.091	.140	.001	.635
是否为公益捐款和义务帮工	-.092	.022	.235	.078	-.077	.651	.500
参与各种组织和社团总数	.060	-.021	-.102	.096	.050	.666	.469
特征值	4.536	3.132	2.132	2.083	2.013	1.291	15.187
平均方差	19.72%	13.62%	9.27%	9.51%	8.75%	5.61%	66.04%

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与测量信任的变量都可以归到一个因子的情况不同,测量社会交往的7个变量被分作两个因子,即表中的第二个因子“社会交往因子”和第四个因子“亲属联系因子”,前者包括与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后者则包括受访者与亲戚和本家族成员的交往,而与同姓村民的交往这一变量则横跨在两个因子之间。第三个因子是“社区安全因子”,归入这一因子的变量包括“庄稼是否经常被盗”、“家中财物是否经常被盗”,以及“邻居是否经常吵架”。第五个因子为“社区认同因子”,包括“邻村姑娘是否愿意嫁到本村”、“是否因作为本村的村民而感到自豪”以及“在本村生活是否有安全感”等变量。第六个因子为“社团互助因子”,包括“是否为公益事业捐款和义务帮工”和“参与社团总数”两个变量。

表4 选举竞争激烈程度的因子分析

项 目	竞选承诺 因子	关系拉票 因子	共量
走家串户,争取支持	.067	.830	.693
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	.068	.763	.587
请族长帮忙争取选票	.202	.816	.707
动员亲戚朋友帮忙争取选票	.210	.812	.703
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实事	.699	.219	.537
答应当选后少收甚至不收提留	.746	.151	.580
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干部的腐败问题	.788	.045	.624
答应当选后带领大家致富	.791	.102	.636
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福利	.678	.104	.471
特征值	2.847	2.690	5.538
平均方差	31.636	29.890	61.526

在本项研究的回归议程中,除了加入受访者个人特征的一些变量,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当过村组干部等,进行预测外,我们还加入村庄离县城距离以及测量选举竞争程度和选举规范实施程度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测量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在问卷中问了这样的问题:“您村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候选人用下

列方法争取选票？”在问题之后我们分别列了9种竞选拉票的方法(参见表4)。根据受访者对这9个项目的回答情况,我们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可以抽取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我们称之为“竞选承诺因子”,包括“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实事”、“答应当选后少收甚至不收提留”、“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干部的腐败问题”、“答应当选后带领大家致富”,以及“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福利”这几个项目,这些手段主要表现为候选人通过承诺当选后做一些事来争取选票;另一个因子叫做“关系拉票因子”,包括“走家串户争取支持”、“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请族长帮忙争取选票”,以及“动员亲戚朋友帮忙争取选票”,这些手段主要是通过感情联系和关系来争取选票。

我们再来看一看测量村委会选举的指标。以往的研究表明,选举是否规范与村民的参与程度有很大关系(参看胡荣,2001)。我们认为选举是否符合选举规范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指标,这里包括候选人如何提名,正式候选人如何产生,以及选举投票的程序等。为此,我们用15个项目来测量选举的规范性(见表5)。在表5中,关于候选人如何提名的问题包括:1.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包括单独提名和联合提名);2.党支部提名候选人;3.乡镇提名候选人;4.上届村委提名候选人;5.村民代表提名候选人;6.村民自荐成为候选人。在这6个问题中,第1、5和6个问题都是正面的问题,越多被访者肯定回答这些问题,表明选举提名的基础越广泛,而不是由上面在小圈子里划定候选人。第2、3、4三个问题则是负面的问题,越多被访问者肯定回答这些问题,表明提名的程序越不民主,是由少数上级领导圈定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叫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如何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过程也是十分关键的(Elk lit, 1997; Thurston, 1998; Pastor & Tan, 2000; O' Brien & Li, 2000)。根据福建省民政厅的规定,在1994年以前的村委会选举中,正式候选人是通过一个叫做“民主协商”的过程产生的,即由村选举领导小组在征求村民和乡镇领导意见的过程中确定正式候选人(福建省民政厅,1994)。这种酝酿协商的结果往往是由村党支部或乡镇决定正式候选人,并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能够使村民的意愿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从1997年开始,福建省民政厅规定正式候选人应由村民代表或选民预选产生,即由村民代表或村民投票决定正式候选人,通过制度保证村民的意愿能够得到体现。那么,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这种制度性的规定是否得到实施了呢?在调查中(见表5),我们

表 5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采用下列措施的村庄和比例

项目	村庄数	比例(%)
1. 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	22	55
2. 党支部提名候选人(-)	5	12.5
3. 乡镇提名候选人(-)	11	27.5
4. 上届村委提名候选人(-)	8	20
5. 村民代表提名候选人(+)	12	30
6. 村民自荐成为候选人(+)	2	5
7. 正式候选人由村民投票产生(+)	19	47.5
8. 正式候选人由党支部决定(-)	2	5
9. 正式候选人由乡镇决定(-)	5	12.5
10. 正式候选人由村代表投票决定(+)	5	12.5
11. 实行差额选举(+)	40	100
12. 开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投票(+)	40	100
13. 仍使用流动票箱(-)	15	37.5
14. 设立固定投票站(+)	23	57.5
15. 设立秘密划票间(+)	20	50

问了这样的问题: 7. 正式候选人是否由村民投票产生; 8. 正式候选人是否由党支部决定; 9. 正式候选人是否由乡镇决定; 10. 正式候选人是否由村代表投票决定。如果被访者对 7、10 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表明正式候选人的确定过程是能够体现选民的意愿的; 如果被访者对 8、9 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表明省民政厅的规定没有得到实施, 村民的意愿不能得到体现。最后 5 个问题是关于投票选举方式的: 11. 是否差额选举; 12. 是否开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投票; 13. 是否使用流动票箱; 14. 是否设立固定投票站; 15. 是否设立秘密划票间。为提高选民投票率, 在福建省的许多地方过去都使用过流动票箱, 选举工作人员提着票箱上门由选民投票(参看胡荣, 2001)。流动票箱在实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选民投票缺乏匿名性, 容易出现舞弊, 因此福建省民政厅从 1997 年开始强调在选举过程不使用流动票箱, 而要设立固定投票站和秘密划票间。因此, 除了把是否差额选举、是否开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投票作为选举是否规范的指标外, 我们还把是否设立流动票箱、是否设立固定投票站以及是否设立秘密划票间作为选举是否规范的指标。不过, 对于本项研究来说, 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关于村一级的资料。获得村级选举方面资料的一种方法是查阅民政部门的统计表格。由于正式统

计数字可能掺杂一些水分,我们在这里打算运用个人的访问资料进行推测。由于被访者对选举本身的知识限制和参与程度不同,同一个村庄的选民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如何把村民个人的回答变成村一级的指标呢?在这里,我们使用多数原则确定村一级的指标。每一个项目都有“是”、“否”和“不知道”三项回答。在每个村庄中我们调查的被访问者人数在20至25人之间。当每个村庄的被访问者在特定项目上回答“是”的人数超过“否”的人数时,我们确定这个村庄采用这个项目的选举措施。经过推算,不同村庄在17个项目上的频数分布情况见表5。由于我们把这17个项目的问题分为正向问题和负向问题,正向问题肯定回答的得1分,否则0分,负向问题肯定回答的得-1分,否则0分。每个村庄在这17个项目上的得分加在一起就是该村在选举规范性方面的总得分。

三、研究发现

以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上学年限、是否党员、是否村组干部、村庄离县城距离、构成社会资本的6个因子(即信任因子、社会交往因子、社区安全因子、亲属联系因子、社区归属因子和社团因子)、选举规范实施程度以及反映选举竞争程度的两个因子(竞选承诺因子和关系拉票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因变量“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①在上述自变量中,“性别”、“是否党员”和“是否村组干部”三个变为虚拟变量。分析结果见表6。

我们先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是否担任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显著影响,男性的参与程度远远高于女性,高出3.374分,在村民的平均参与度只有6.6分的情况下这一差异是相当大的。跨国比较表明,在发达国家,男女的政治参与差异

^①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参看边燕杰、李煜,2000)。

不大,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较大(Nie et al., 1974),一个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也表明发达地区男女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小于落后地区(Goel, 1975)。史天健在北京城市社区的研究表明,男女市民的投票参与虽然都受年龄的较大影响,但二者的参与率相去不大(Shi, 1997: 170)。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居民素质较高,因此男女的政治参与差别不大。但中国农村原多为落后地区,居民文化素质较低,在政治参与方面男女相差较大。

表 6 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程度的因素(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显著性水平
性别 ^a	3. 374	. 128	.001
年龄	. 364	. 388	.055
年龄的平方	- . 004	- . 424	.031
上学年限	. 033	. 010	.829
是否党员 ^b	3. 580	. 097	.011
是否当过村组干部 ^c	4. 061	. 113	.002
村庄离县城距离	- . 130	- . 128	.000
选举规范实施程度	1. 419	. 154	.000
社会资本:			
信任因子	- . 636	- . 048	.173
社会交往因子	. 230	. 017	.627
社区安全因子	. 261	. 020	.578
亲属联系因子	- . 362	- . 027	.446
社区归属感因子	1. 274	. 097	.007
社团因子	1. 513	. 117	.001
竞选激烈程度:			
竞选承诺因子	1. 954	. 151	.000
关系拉票因子	- . 573	- . 044	.230
常数	- 7. 194		.148
N	698		
Adjusted R Square	17. 2%		
F 检定值	10. 072	. 000	

a 参考类别为“女性”; b 参考类别为“非党员”;

另一方面, 年龄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的影响呈倒 U 型。有关年龄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国外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正如米尔布拉斯所指出的, “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在 40 和 50 岁达到顶峰并稳定一段时间, 然后在 60 岁以上逐渐下降” (Milbrath, 1965: 134)。国外一些研究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关系的存在 (Milbrath & Goel, 1977; Nie et al, 1978)。史天健在北京的调查亦发现市民的投票率与年龄的关系呈倒 U 型, 以 45—53 岁年龄的受访者的投票率最高 (Shi, 1997: 168)。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外学者的发现是一致的, 年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呈倒 U 型,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村民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 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我们通过不同年龄组参与平均值的比较发现, 30 岁以下组村民的选举参与程度较低, 参与的平均值是 5.07, 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 31—40 岁年龄组为 6.33, 到了 41—50 岁年龄组达到最高, 为 8.93, 随着年龄的增长村民的参与开始逐步下降, 61—70 岁组和 71 岁以上组的参与均低于 30 岁以下组, 分别为 3.87 和 3.41。虽然生命周期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 但在回归分析中, 我们加入个人政治面貌和是否村干部等方面的控制变量后, 年龄依然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显著影响。为什么生命周期对政治参与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与生命周期相关联的“精力”使然。当然, 这一认识仍有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予以讨论。

我们再来看一看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些研究表明(参看 Campbell et al., 1960; Verba et al., 1978), 教育程度与投票参与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即文化程度越高者参与的比例也较高, 而对共产党国家的研究则发现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参看 Bahy & Silver, 1990)。因为在选举沦为纯粹的形式的前提下, 选民无法对候选人进行选择, 文化程度越高者越可能以不参与的方式表示不满。但是, 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 村级选举不同于共产党社会的其他选举, 而是一种在一定程度内有选择的选举(参看胡荣, 2001)。如果只从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对参与程度的影响来看, 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的参与平均值有明显不同, 较高者参与程度也较高, 未上过学者的参与程度为 4.32, 上学 1—3 年者为 6.59, 4—6 年者为 6.83, 7—9 年者为 6.91, 10—12 年者的参与度最高, 为 9.19; 不过, 上学年限在 13 年以上者的参与程度又有所下降, 为 5.82。这一结果与史天健在北京

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Shi, 1997: 145—146)。史天键的研究表明,北京市民的投票参与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但受教育程度达到18年以上的受访者的参与程度却是最低的。在本项研究中,上学年限13年以上组的参与程度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却大大低于10—12年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以后,就转为非农业户口,他们的工作也由国家统一安排。近年来由于国家不再分配工作,一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也回到农村自谋职业。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农村较难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因此他们呆在农村往往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有机会他们还是要到城里找工作。这种情况就使得他们文化程度虽然最高,但对村里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程度却不如文化程度比他们低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上学年限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虽然单因素的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总体上能够增进村民的参与程度,但多因素回归分析却表明文化程度对参与程度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本身不对村一级选举的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如果说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需要参与者具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话,那么,在行政村这一基层社区里,受教育程度便不是十分重要的了。因为不管是文盲还是大学毕业生,都一样能够知道谁是否有能力管理村里的事务,谁办事更公正,谁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回归分析还表明,受访者是否党员和是否担任组干部这两个变量对他们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有很大影响,二者对因变量的影响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回归系数也比较大。是否党员对因变量影响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3.58,表明共产党员比一般村民的参与程度高3.58分,而担任村组干部者比一般村民的参与程度更高出4.061分。

那么,社会资本的诸因子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又有怎样的影响呢?第一,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程度越高。在构成社会资本的6个因子中,只有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因子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区认同因子对因变量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是0.094,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村民的社区认同感越强,就越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越可能较多地参与到选举中来。第二,参与的社团越多,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也越高。社团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117。如前所述,虽然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参与的社团还十分有限,受访者中只有 36% 的人参与社团,而平均每个村民参与的社团只有 0.54 个,但回归分析清楚地表明,村民参与的社团越多,他们越可能参与村委会的选举。第三,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因子对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社会资本的 6 个构成因子中,除了上述的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外,其他 4 个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信任因子和社会交往因子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帕特南看来,社区成员之间的横向交往促进了人际间的信任的建立,因而使得人们之间更容易形成合作关系。为什么社会信任因子和社会交往因子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不具有显著影响,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作为控制变量的选举竞争程度和选举制度实施情况对因变量也有很大影响。在测量村级选举竞争激烈程度的两个变量中,“竞选承诺因子”不仅对因变量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标准回归系数也高达 0.151。但是,“关系拉票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以往的一些观察发现,选举竞争越是激烈,特别是候选人势均力敌的时候,双方都会采取各种方法争取选票,从而使更多的选民参与到选举中来(参看胡荣,2001)。但是,究竟是哪些手段更能促使选民积极地参与村级选举呢?以往的研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因子分析把通常村级选举中候选人经常使用的 9 种手段分成两个因子,第一因子包括争取选票的 5 种手段,即候选人在竞选中许诺当选后为民办实事、少收提留甚至不收提留、调查前任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带领大家致富以及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福利;另一个因子涵盖争取选票的另外 4 种手段,即通过走家串户以争取支持、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请族长帮忙争取选票以及动员亲戚朋友争取选票。如果第一个因子的 5 种手段有利于村级选举的健康发展的话,后一因子的 4 种手段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具有正当性和不利于选举的健康发展的。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能够提升村民参与程度的是积极的竞选手段。

选举实施的程度也对因变量有重大影响。我们用 15 个指标测量村级选举的规范程度。回归分析表明,越是规范,村民的参与程度也越高。另外,村庄距县城所在地的距离也对村民的参与有重要影响,村民离县城越远,村民参与的程度越多。

四、讨论与结论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参与有许多类似之处的话,那么 19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使得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基层的政治参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这种参与叫做地域性自主参与,它既不同于过去的那种动员式参与,也与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有很大不同。首先,这种参与是一种自主式的参与,因为村级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不同过去那些流于形式的选举,村民能够通过村级选举表达他们的利益,村民是否参与完全是自身利益算计的结果。相关研究表明,为了能够在下一次选举中连任,对于当选的村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选民的关系,他们既要通过办一些实事(如建学校、修路等)来获得选民的信任,在办实事的过程中又不能损及村民的利益(参看胡荣,2002)。在本项研究中,有多达 25.5% 的受访者认为在竞选期间有候选人通过“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事”来争取选票,24.1% 的受访者认为有候选人通过“答应当选后带领村民致富”来争取选票,还有的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有的答应当选后少收提留,有的甚至许诺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村民办实事。正是这种选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农村居民可以定期选举向村领导表达他们对于本行政村的一些重大事务的选择偏好。因此,在中国农村,村一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参与基层政治的重要途径。正因为有了这一参与途径,才会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性质,即从原来毛泽东时代的动员式参与演化为现在的自主式参与。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居民虽然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运动,但普通老百姓并不能通过这种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而是被当政者作为宣传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手段(参看 Burns, 1988; 周晓虹, 2000)。而村级选举中村民的参与却是一种自主式的参与,它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和农民自主性的提高而出现的。作为自主式的参与,农民通过参与选举表达自身的利益。因此,参与与否和参与程度完全是他们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的,而不是出于上级的政治压力。像参与其他政治活动一样,参与村级选举需要村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付出,因此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村民只有在参与得到的回报大于参与的成本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参与选

举。这也就是在上述回归方程中“选举制度实施程度”这一变量会对村民参与有重大影响的原因。“选举实施程度”这一变量综合了问卷中的15个问题,从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到正式候选人的确定以及选举投票等内容。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实施以来,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如果在选举制度不太完善的情况下村民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的话,那么在选举制度得到较好实施以后,村民更为积极地参与了村级选举。因为在选举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选举可能会被操纵,“组织意图”可以更好地体现,而村民选票的份量则要大打折扣;但在选举制度得到落实的情况下,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是村民手中的选票,因此村民参与的效能感大大提高,他们更愿意参与选举。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决定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影响大小的因素是参与投票的选民的多少。参与投票的选民越多,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越小,很小的投票成本都会超过投票的价值;相反,投票的人越少,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大,投票的价值大于投票的成本(Downs, 1957: 267)。在村委会选举中,决定每一张选票价值大小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选举是不是真正的选举。如果选举是被操纵的或是流于形式的,那么选票是不重要的,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随着选举程序的改进和选举制度实施,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增大了,投票的价值超过了投票的成本,村民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也就相应提高了。

但是,这种参与又是地域性的,它与一个由几百到数千人组成的行政村相联系。农村居民不仅生活和生产在同一区域,而且社区内简陋的服务设施也主要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来提供,这使得农村社区(即村民生活的村落)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城市社区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社会资本的诸因素中,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对他们的参与程度才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对社区认同感强的村民往往能够更积极参与到选举中来。与这种基层政治参与的空间狭隘性相联系,受教育程度对参与程度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在一个只有数百或几千人的小社区里,参与公共事务并不需要接受太多的教育。

参与的地域性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农村居民目前的这种自主式政治参与仅限于行政村这一基层社区,在更广的范围内,比如乡一级、县一级或是省一级,农民参与的渠道还是十分缺乏,农民仍然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对于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农民不得不诉诸上访、群体抗争等方式(参看 Li & O' Brien, 1996; O'

Brien, 1996; 萧唐鏢, 2003; 于建嵘, 2003; 陈桂棣、春桃, 2004)。要使中国农村居民的参与都能成为自主式参与, 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边燕杰、李煜, 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期。
- 陈桂棣、春桃, 2004,《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福建省民政厅, 1994,《村委会选举工作指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弗朗西斯·福山, 2001/1998,《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 郭正林, 200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胡荣, 2001,《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 , 2002,《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
-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 1989,《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李伟民、梁玉成, 200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尼·诺曼、西德尼·伏巴, 1996,《政治参与》,《政治学手册》(下册),格林斯坦、波尔比编 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帕特南, 2001,《使民主运作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托克维尔, 1988,《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韦伯, 1995,《儒教与道教》,王容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萧唐鏢, 2003,《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以农民行动的变化为视角》,香港:《二十一世纪》4月号。
- 阎云翔, 2000,《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于建嵘, 2003,《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第3期。
- 周晓虹, 2000,《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7卷,秋季。
- Almond, Gabriel A. &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ies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hry, Donna & Brian Silver 1990, "Soviet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Eve of Democrat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3).
- Barayan, Deepa & Michael F. Cassidy 2001, "A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ocial Capital Inventory." *Current Sociology* 49(2).
- Bialer, Seweryn 1980,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an, Yi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ums, John 198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Coleman, Jame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Elklit, Jorgen 1997, "The Chines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oral System." *China Information* 11(4).
- Falkenheim, Victor C. (ed.) 1984,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Freidrich, Carl J., Michael Curtis & Benjamin R. Barber 1969,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Praeger.
- Friedrich, Carl J. & Zbigniew Brezezinski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el, Lal M. 197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 India*.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 Goodman, David S. G. (ed.) 1981, *Grou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monk, N. Y.; M. E. Sharpe.
- Inkles, Alex & Raymond A. Bauer 1959,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Palombara, Joseph 1975, "Monoliths or Plural Systems: Through Conceptual Lenses Darkly."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8(3).
- 197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idney Verba & Lucian W. Pye (eds.), *The Citizen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mford, Conn.; Greylock Publishers.
- Li, Lianjiang & Kevin J. O'Brien 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2.
- Liu, Alan P. L. 1976,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Books.
- Lochner, Kimberly, Ichiro Kawachi & Bruce P. Kennedy 1999, "Social Capital: A Guide to Its Measurement." *Health and Place* 5.
- Milbrath &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brath, W. Lester 196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 Nie, H. Noma, Sidney Verba & Jae on Kim 1974,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 Cycle." *Comparative Politics* 6(3).
- O'Brien Kevin J.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
- O'Brien, Kevin J. & Lianjiang Li 2000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2.
- Onyx, Jenny & Paul Bullen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36.
- Pastor, Robert A. & Tan Qingshan 2000, "The Meaning of China's Village Elections." *China Quarterly*

162.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rlet, Robert S. 1969, "Concept Form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rederic J. Flernon Jr.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 Shi, Tianjian 199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killing, Gordon H. & Franklyn Griffiths (eds.) 1971,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M. 1982,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urston, Arne F. 1998, "Muddling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in Grassroots China." *Peaceworks*, No. 23,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Townsend R. James 196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 Jae-on Kim 1971, *The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Berkele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
-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olcock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张宛丽

Abstract: Class advantage inheritance has been detected as a main and universal mobility regim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alysis over past decades. Data collected from a transition society of China has also proved the same mobility pattern. The author argued that industrialist and institutionalist logic which has ever dominated Western mobility researches did not give any sounda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n this paper,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this universal mobility features has been launched from two aspects: reproduction and dominance mechanism.

Social Capital and Villagers' Local Autonomou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 A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s *Hu Rong* 61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1 survey data of Shouning and Xiamen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sex, age, party membership and cadre status influenc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only association factor and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factor in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e to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while social trust factor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village elections influence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The paper shows that,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villagers to voice their interests in local community affairs now, so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 can be labeled as "local autonomous participation".

Self-identity of the Passive-urbanized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Urban Adaptability and Modern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561 land-displaced peasants in Nanjing *Zhang Haibo & Tong Xing* 86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61 land-displaced peasants in Nanjing in 2004, from perspective of self-identit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land-displaced peasants are experiencing self-identity maladjustment. Most of them haven't attained their self-identity in the new system, because their self-identity transitions lag overly behind their physical migration and strong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consequence of passive urbanization that they have encountered. The longer the peasant's land is displaced, the easier their self-identity is transitioned. It means "Time Effect". The stronger they feel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harder they achieved self-identity transition. It means "Place Effec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proposition yet to be further proof-tested — the social reference frame/system of self-identity of the passive-urbanized group is taking on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es.